其三，還原消失歷史記憶，以史為鑑的價值取向。本書承接 Kate Brown 對多元民族混合地區的歷史演變、空間融合、民族認同的研究，跨越奧斯曼帝國省界與民族國家界限，從自然地理空間研究賈茲拉。突破了傳統學界對該區域的研究框架，還原了近幾十年來賈茲拉從地圖與民眾記憶中消失的歷史。賈茲拉暴力極端與環境破壞的歷史仍在延續，伊斯蘭國和庫爾德工人黨等組織在該地崛起，還存在殺蟲劑污染與農業乾旱等問題。作者通過長時段研究揭示改革負面影響，並對現實中某些國家意圖推行歷史相似的民族遷徙政策提出警醒。

總體而言，該書史料翔實、邏輯嚴密、理論前沿、以古鑑今，追溯了省份劃界與農業轉型改革對賈茲拉的歷史影響。不僅豐富了奧斯曼帝國晚期改革史與環境史的研究範式，為後人進行中東環境史研究提供理論路徑，而且給讀者一個新視角，讓他們超越民族國家界限與人類中心主義，從環境管理作為國家治理與民眾抵抗工具的角度，觀察奧斯曼帝國晚期歷史。此外，本書尚有一些可繼續推進之處：第一，從中國中東史研究來看，或可借鑑本書環境史理論，結合中國的中東研究理論如文明交往論等推進研究。第二，本書以蝗蟲這種動物展開研究，後來者或可從環境史中的植物角度推進研究。

趙震宇
陝西師範大學中亞研究所

郭靜云，《商文明的信仰世界與傳統思想淵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1281頁。

近年來，一系列系統、科學的遺址調查與發掘工作積累了豐富的考古資料，為重構上古歷史提供了扎實依據。這些新資料不僅拓展了對三代時期不同區域、不同階段社會形態的認識，也使學界能夠從生產技術、物質文化與精神觀念等多重視角，更全面地探討早期國家的形成與演進機制。儘管中國上古史研究已取得突破性成果，展現出廣闊前景，但仍面臨諸多根本性挑戰。如中國青銅時代的歷史圖景雖呈現多元面貌，但代表精神文化的禮器造型和紋飾卻為何高度相似？這些禮器背後隱藏着什麼樣的精神世界？其與後來中華文明傳統思想又有何種淵源關係？這些基礎問題背後，實際涵

蓋了一系列複雜而深層的學術難題。郭靜云所著《商文明的信仰世界與傳統思想淵源》（以下簡稱《商文明》）正是對上述問題進行系統回應的學術力作。

《商文明》分為3編：上編「昊天充滿神獸：商文明祈天的信仰結構」致力於梳理上古神獸崇拜的源流與體系；中編「非獸形的崇高對象和人形的天人媒介」着重探討「天」「帝」「祖」等神聖概念的形象與內涵，以及巫覡作為人神溝通媒介的功能與角色；下編「從天神到天地之道：易與道觀念的先跡」分析天地、乾坤、神明、五色、道等觀念在上古信仰中的表現形態及其向哲學範疇的演變過程。

上編第一至第六章集中論述夔龍如何由動物崇拜上升為商王國國家信仰的核心。作者指出，神龍形象濫觴於早期文明對昆蟲的崇拜，存在遼西地區與江河中原地區兩大起源系統。前者隨歷史潮流融入中國多元文明體系；而源自長江中下游、頭尾具口的蟲形龍意象在區域文化互動中不斷演變，並於後石家河至盤龍城階段的青銅時代趨於定型。湯商政權進一步將其擢升為國家宗教主神，伴隨商文明的政治與文化興盛，這一藝術母題衍生出如饕餮等多種造型，其信仰體系也廣泛傳播，為中國上古農耕文明奠定了共同的信仰基礎。

在系統闡釋夔龍天神信仰的基礎上，上編第七至第八章進一步考察了虎、鳳及其他神獸在商代信仰結構中的屬性與功能。通過綜合器物、紋飾與甲骨卜辭等資料，作者認為，鳥類崇拜作為古老信仰形態，既被視為族群始祖與徽號象徵，也與天象觀測體系密切關聯，常以特定鳥形對應日月星辰的運行。相比之下，虎崇拜形成較晚並具明確的權力象徵屬性。虎崇拜初源於華南與東北遊獵族群，後在文明進程中與江河中原地區的神龍信仰交融，形成雙虎饕餮、虎噬人等具有神秘意涵的藝術母題。在殷商帝國，虎不僅作為王室的守護神獸，更成為國家軍事實力的視覺表徵，構成王室禮儀信仰的重要符號。然隨着神獸崇拜的整體衰落，社會觀念表達逐漸由具象造型轉向抽象概念，虎崇拜亦隨之淡出信仰體系核心。

神獸崇拜並非中國青銅時代信仰的唯一主題。本書中編將視角轉向天體及人格神。第一章「商文明崇拜昊天的內涵」通過系統考釋甲骨文、金文中與「天」相關的字形結構與語義脈絡，論證只有從「上」從「大」的構形才眞正對應「昊天」宇宙觀念。並指出，在商代信仰體系中，「昊天」尚未被賦予政治權威屬性，雖為帝、祖與神獸之所居，卻未與王權直接結合展現支配力量，而是作為「地」的對應範疇，共同構成萬物化生的時空框架。

中編第二至第三章討論居於「天中」的「帝」、位於地之中央的王，以及二者的內在關聯。「帝」信仰源自對北極天中的崇拜，其字形結構不僅具象呈現了夏時代北極天中的天象特徵，亦保留了巫覡推定北極的儀式方法。「帝」既是宇宙秩序的體現，亦成為商王神聖權力的象徵來源。居於地中的商王通過祭祀與天帝溝通，祈求授權與護佑，並期望身後升天永伴於「帝」，構成天帝周圍的「紫宮」。王權的神聖性不僅源自帝令，亦承自祖令，體現了祖先崇拜在信仰體系中的核心地位。早期的祖先崇拜常與太陽信仰結合，表現為扶桑十日、後羿射日、十日喪禮等神話敘事。扶桑神話反映了屈家嶺文化國家形成初期，多個以日為始祖的邦國結盟共治的政治結構，十日輪流升天象徵諸邦輪流執政的盟約制度。而至夏代，隨着集權體制的強化，羿射日神話的興起，實是表達為削弱十日聯盟集團內舊貴族勢力而強調獨一神權法統的意識形態。成湯在建立商時，為鞏固統治，重新藉助十日神權傳統，整合貴族力量，以此為基礎建立起系統的十日宗廟制度與王室喪葬禮儀。

中編第四章聚焦於商代禮器中的人面圖像。在商文明青銅禮器中，多見神獸吞噬人頭的造型。針對這一現象，學界曾提出薩滿通靈、辟邪驅祟等解讀，雖具啟發性，卻未具充分說服力。本章通過系統梳理相關資料，提出該造型應理解為獻巫儀禮，其中人首形象指向作為人神媒介的巫師，其升天賓帝的宗教功能通過頭部被神獸含噬的圖式呈現。這一表現方式或與古代觀念中頭部象徵人之「天」，且獨具升天神性的認知有關。

接續上、中篇對商文明神聖形象及其觀念的系統分析，下篇將筆調轉向中國大傳統中的重要思想觀念，以及古代儀式規律所蘊含的基礎概念的起源。第一至第三章通過早期甲骨卜辭討論《周易》思想的雛形，涉及天地相交及「神明」等概念。甲骨卜辭中常見「上下若，授我祐」的固定句式，其語法結構反映了商王祈求達到「天地交而萬事通」的狀態。這種占卜方法已顯現出後世《周易》陰陽卦爻體系的雛形。在先秦思想體系中，「神明」是由兩個相對範疇構成的複合概念，意指天地交互作用的媒介，其結合狀態象徵「天地合德」的宇宙秩序，而正是天地交融才孕育萬物生機。在早期信仰基礎上形成的「神明」觀念很快超越其「天降神、地出明」的本義，開始向禮制化和哲學化方向發展。西周禮制正是以此為基礎建構而來，儒家繼承並發展了禮制維度下的神明觀，而易學與道家則着重探討神明觀的自然哲學意涵。戰國早中期的思想家尚保持接近神明觀的理解，但隨着概念抽象化程度加深，至戰國晚期，神明觀的內涵極大豐富，遠超其原義。及至漢代，百家思想式微，上古信仰中關於「神明」的本眞含義也湮沒不彰。

下編第四章系統梳理五色概念的形成脈絡。五色觀念亦建基於神明觀，可追溯至商代祭祀傳統。當時五色皆取象自然現象，蘊含豐富的精神內涵，用以表現生死、離合等自然規律與社會關係。其中，「上下幽黃」的宇宙觀念構成核心架構，白色被賦予溝通天地的媒介功能，血色則兼具標識純潔犧牲與社會盟約的雙重意義。至西周，顏色體系進一步系統化，與方位、季節形成固定對應關係：玄象天，黃表地，幽、朱、冏分指東、南、西三方，標誌五色觀念從祭祀符號向哲學範疇的轉型。

下編第五章聚焦於商周時期「道」觀念的本義及其演變脈絡。商文明中「道」信仰的核心為「上導」，指一種超越性的指引力量，能夠引導商王在重大行動前擇定避災的正途，此為老子學派的思想淵源。由於根植上古信仰，道家思想始終帶有神秘特質，「道」在哲學化進程中被不斷賦予新解。隨着戰國學派分化，各家對「道」的多元闡釋使其內涵持續擴展，最終昇華為統攝萬有的本體概念。在此過程中，「道」與「元氣」、「陰陽」等概念相互融合，形成等同關係。經這番演變，「道」最終突破原有信仰框架，形成與上古體系既淵源深厚又本質迥異的新信仰形態。

《商文明》一書是著者在中國上古史研究領域內，圍繞中華早期精神文化結構演變、儒道思想體系形成脈絡及其文明源流所作的系統性闡釋。依筆者所見，該著作的學術價值主要體現在以下3方面：

其一，從各類碎片中立體而情境化地復原上古巫覡信仰的整體圖景及其動態演化脈絡，並勾勒出其與後世中華文明的源流關係。歷史研究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源自碎片化的各種研究資料，即對零散資訊進行蒐集、整理與分析。《商文明》所討論的「碎片」更為複雜，如神獸形象、神秘符號、儀禮片斷等，這些非敘述性的形象語言與我們慣常使用的表達方式區別甚大，如何破譯這些形象語言的密碼？本書根據出土器物、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重點關注龍、虎、鳳等神獸，以及「天」、「帝」、「祖」等，將這些「碎片」還原至其物質原境和文化原境當中來討論，透物見人，最終呈現出商代精神世界的完整圖景：天中為「帝」所居，先王配祀其側；四方有鳳鳥司掌中央與四方的溝通；神龍通過吞吐實現上下溝通；水下玄龜感知天意、參與上下之交；王則居於地中，承擔貫通天地、協和四方的職責，通過明德祭祀實現人神對話。

其二，透過對精神文化的復原，更有力地印證了作者一貫論述的中國青銅文明歷史脈絡。長期以來，以「鄭洛中原」，即嵩山地區為中心的王朝史觀主導着三代研究。作者曾提出「江河中原」概念，重新界定商文明的地域

格局，認為眞正的「中原」應指長江中游與黃河鄭洛之間的農耕平原。考古資料表明，長江中游自舊石器晚期以來，至新石器時代，其文化發展一脈相承至青銅時代，從未斷絕。約公元前1300年，隨着北方殷墟族群南下征服盤龍城，吸收其文化並自詡為商，政治中心才開始北移。本書承襲作者既有論述，突破傳統成說，完全從資料出發，為重構上古史提供了新範式、新證據。

其三，注重多學科融合的自覺與反思。儘管以考古資料為根本依據，作者在具體分析過程中靈活運用文獻考據、圖像解析、藝術母題溯源、古文字釋讀及神話學、人類學等多元方法，形成獨具特色的研究路徑。當前學界雖普遍宣導跨學科研究，試圖從多維度深化對先秦社會的認知，並借此重塑歷史格局、提升研究視野，但在實踐中常陷入「理論先行」與「結論先行」的誤區——或以外來理論框架生硬切割史料，或以預設觀點篩選證據，導致對歷史細節與文化語境的遮蔽。本書則始終以問題為導向，審慎評估不同資料與方法在研究目標中的適用性與邊界，從而構建起一個根植於中國上古文化的闡釋體系，為重新理解青銅時代的社會結構、思想觀念、宗教信仰與禮俗實踐開闢了新的可能。

正如陳寅恪先生近百年前所宣導的「預流」精神，在考古資料日益豐富的今天，先秦史研究亟需以新視角切入關鍵問題，從而推動學術格局的革新。在這一學術脈絡下，《商文明》通過對信仰體系的結構性解讀，實現了對先秦歷史圖景的深度重構。該書的學術意義遠不止於青銅時代研究，其獨特的問題意識與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對後世不同時期的文化史研究亦具有重要的參照價值。

任欣
南京大學全球人文研究院

孫正軍，《禹跡茫茫：唐宋嶺南九州分野言說的知識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5年，362頁。

在中國古代，〈禹貢〉九州是一個重要的地理概念，其如何影響後世的地理認知，學界研究尚有待開拓。孫正軍著《禹跡茫茫：唐宋嶺南九州分野言說的知識史研究》是關於此問題的第一部專著。該書以嶺南歸屬九州的言說為研究對象，時段主要限定在唐宋。嶺南地區相對較晚才被納入中原王朝